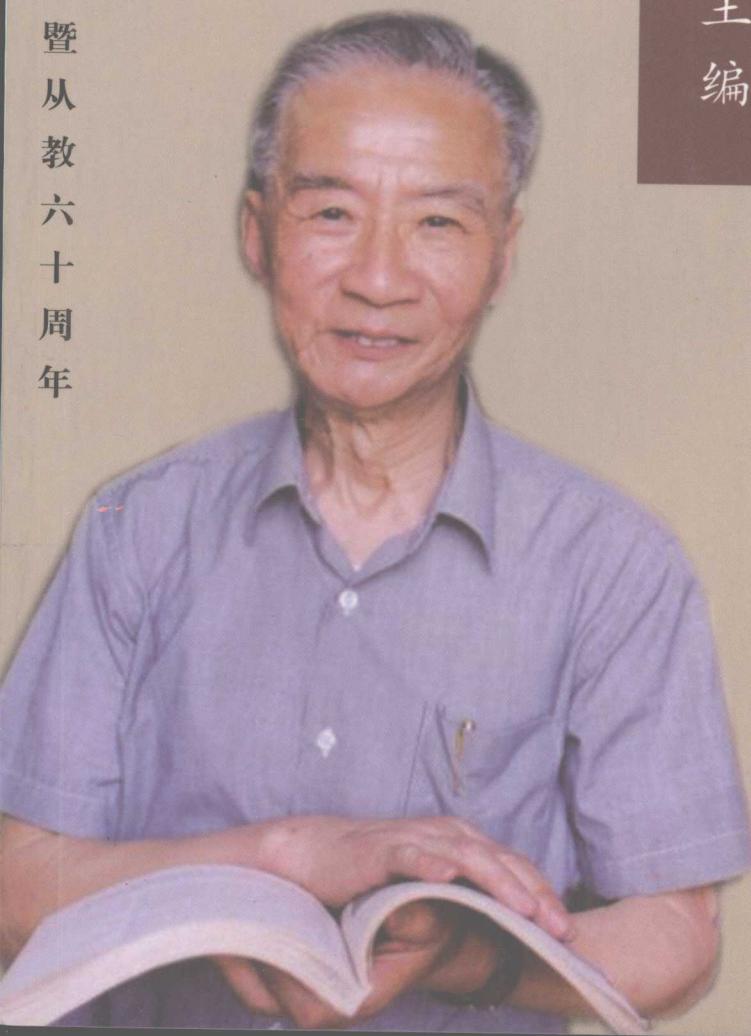


庆祝瞿葆奎教授八十五寿诞暨从教六十周年



郑金洲 ◎ 主编

# 教育的 意蕴

福建教育出版社

# 教育的意蕴

郑金洲◎主编

福建教育出版社



庆祝瞿葆奎教授八十五寿诞暨从教六十周年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教育的意蕴——庆祝瞿葆奎教授八十五寿诞暨从教六十周年  
/郑金洲主编.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8. 4  
ISBN 978-7-5334-4987-2

I. 教… II. 郑… III. 教育学—文集 IV. G4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54753 号

### 教育的意蕴

——庆祝瞿葆奎教授八十五寿诞暨从教六十周年

郑金洲 主编

---

出版发行 福建教育出版社

(福州梦山路 27 号 邮编: 350001 电话: 0591—83726971)

83733693 传真: 83726980 网址: www. fep. com. cn)

印 刷 福建省天一屏山印务有限公司

(福州铜盘路 278 号 邮编: 350003)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3.75

字 数 412 千

插 页 2

版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 100

书 号 ISBN 978-7-5334-4987-2

定 价 36.00 元

---

如发现本书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向出版科(电话: 0591—83726019) 调换。

## 前 言

风月无边，庭草交翠。

恭逢恩师瞿葆奎先生八五寿诞暨从教六十周年，弟子无不欢欣鼓舞，于是动议：结集文章，聊作贺仪，以铭师恩。我们认为，先生耕耘学术六十载，培育桃李满天下，最希望看到的，最感到高兴的，也许就是他挚爱的事业得以承续光大，他授业的弟子在教育领域有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

知识改变命运，导师成就人生。我们的境遇大多因为先生而发生转变，因为先生而步入学术人生的轨道。正是他以质朴的品格、淡泊的情怀，指引我们漫步人生的航程、感悟处世的真谛；正是他以丰硕的学识、宏阔的视野，引导我们踏上学术的征途、探求教育的奥赜。“堂堂正正做人，踏踏实实为学。”先生相信，做人第一，只有“堂堂正正做人”的人，在学问探索上才可能是“踏踏实实”的。尽管我们从事的研究领域互有差异，但是这十二字箴言却一直伴随着、引领着我们的成长和发展。

跟随先生左右聆听教诲、研读讨论的日子，虽已远去；但是先生的教诲言犹在耳，不敢忘怀。从严格的“一天三班制”到定期的“学术星期六”，从“三个一点”（觉少睡一点，天少聊一点，影视少看一点）的要求到“三个甘于”（甘于艰苦，甘于清贫，甘于寂寞）的期望，从学习上的“三个为主”（以理论学习为主，以专题研究为主，以自学、讨论为主）到研究上的“三个统一”（历史与逻辑相统一，材料与观点相统一，叙述与评析相统一），等等，都体现了先生在培养学生方面的“别具一格”，而这种“别具一格”实际上寄寓的是先生对学生的殷殷期切，折射的是先生对学生的高度责任感。

从我们亲身的经历、感受和体悟来说，先生在引领我们走上教育学术道路方面，大致可以用五个关键词来勾勒其特征：

领域——知识领域是研究者思想的平台、生存的空间。特别是在当代教育知识日渐分化和多样的背景下，研究者不可能博习深究教育学的一切领域

或分支，而应该首先扎根教育学的某一领域或学科，达到细致而精深的境界，然后再循序渐进地向相关领域或学科拓展。因此，先生在培养研究生时，明确要求他们在教育学的园地里确立自己的专攻领域或学科。我们是先生这种定位的直接受益者，各自逐渐在教育学的各个分支领域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问题——任何研究都是从问题开始的，都试图去弄清或解决问题。对于“平铺直叙”的写作，对于“波澜不惊”的叙述，先生以为都与问题不明或没有问题有关。他常说，研究必须有问题指向，必须有“对立面”；唯其如此，研究才能“立体”，才会引人入胜，才能发人深省。进入某一领域或学科之后，我们需要从“主题化”的写作转向“问题化”的研究，从建构学科体系取向转向问题探究取向。

多样——多样性是学术发展的良性“生态”。对于学生的要求，先生从来不是“千篇一律”，而是鼓励我们结合自己的兴趣，自由选择专攻的学术领域；结合自己的特点，自主选择恰切的研究方式，走“多样化”、“个性化”的专业发展道路。有些人擅长思辨，就关注教育中的形而上学问题；有些人偏爱实证，就深入现场，搜集资料，把握教育事件的“真相”。在先生看来，没有多样性，学术就没有生气，就没有活力，就没有创生的可能。

自由——先生一直认为，“只有一种观点的学术，是窒息了的学术；没有争鸣的学术，是死亡了的学术”。在探究教育真理的过程中，需要打破“一团和气”，不限于思想的“共鸣”，更重要的是，营造开放的空间，允许自由的讨论，引发真正意义上的学术“争鸣”，经常有“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的景象。先生自己身体力行，为我们起到了表率作用。

规范——在思想上，先生是推崇自由的，但在撰述上，先生是严格规范的。从句读标点到引文注释，从遣词造句到谋篇布局，先生都不容许有任何的疏忽或错漏，更不用说在观点陈述和逻辑论证上了。对于学术腐败，先生不仅感到痛心，而且采取各种措施予以坚决抵制，以求学术环境的“净化”。他认为“学术研究是与存真求实、脚踏实地联系在一起的，是与探索创新、锐意进取联系在一起的，没有真实、诚信，也就没有了学术的生命。”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我们无不景仰，无不为其浸染。正是循着先生的足迹，众生在教育研究的领地里潜心钻研，自由驰骋。本书的各篇即是弟子们扎根各自领域而形成的成果。这些文章自然不能与先生的境界相比肩，但是所谓“心向往之”，我们总是努力去接近它，领悟它，尝试它。假如我们去细细体味，还是可以感受到这些论题和方法与先生研究的直接或间接的关联。譬如，有些是承续先生元教育学研究之余绪，探讨教育学在时间长河中的

“驻足”或“漂流”；有些依循先生课程与教学研究之步伐，追踪中国语文教育的百年历程；有些重回马克思主义，以社会演进为背景，勾勒教育发展的阶段，寻求教育与人的自由发展的联系；有些直接展现先生治学的风貌，讲述先生对自己学术历程的深刻影响。诸文或回溯历史，或针砭现实，或展望未来，但都只是我们在通往教育理论征途中的一次“驻足”，在领略先生学术风范过程中的一次“体验”。

怀着对教育学“爱慕之情，仰望之心和探究之志”，先生为中国教育学的发展尽心竭力，虽至耄耋之年，依然孜孜不倦，致力于中国教育学的资料整理和学科建设。出版这本文集，目的不仅仅在于将弟子对先生的感激和祝福融入文字，更重要的是，我们是以一种方式将先生的学术薪火传承下去，感沐先生之德风，激扬先生之学问——这也许才是最好的礼物！

最后，让我们真诚地恭祝先生寿比南山！

郑金洲 程亮

2008年1月1日

# 目 录

瞿葆奎、郑金洲、程 亮

中国教育学科的百年求索 ..... 1

沈剑平著 袁文辉 程 亮译校

美国教育学概念的演进及其意义 ..... 17

黄向阳 康德与教育学 ..... 47

谭晓玉 教育法学的何谓与何为 ..... 58

刘家访 我国社会科学本土化:背景、问题与出路 ..... 88

吴德刚 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的再认识

——兼论教育工作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 106

涂艳国 人的自由发展是教育的重要目的 ..... 117

罗明东 人类社会教育发展三形态论 ..... 140

熊川武 论反思性教育实践 ..... 155

蒋士会 教育公平结构论 ..... 164

唐晓杰、朱俊杰

试论基础教育在创新人才培养中的奠基作用 ..... 176

范国睿、李树峰

多元文化价值导引健康教育生态 ..... 197

郑金洲 学校内涵发展:意蕴与实施 ..... 209

崔允漷 论我国课程变革实施之研究路径

——兼评当前学界热衷“教师”研究的热点问题 ..... 220

郭元祥 从“作为事实”到“作为实践”:课程理解的转向

——兼论课程研究中的思维方式 ..... 230

王 枫 教育叙事研究的反思 ..... 240

刘孝学 从“形式”与“实质”之争说到语文教育的百年难题 ..... 251

张 玲	如何进行人格教育:情感体验的进路 ——以西方心理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为资源的分析	267
马凤岐	重新审视“高等教育”的定义	280
周浩波	关于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几点思考	291
徐玉珍	关于研究生教育的几点思考	301
孙绍荣、宗利永、鲁虹		
	高校教师教学行为模型描述与教学质量监控制度有效性分析	
	.....	314
任长松	美国大学入学考试 SAT 深度剖析	323
李复新	澳大利亚中文教育的现状、趋势与分析	335
附录:		
喻立森	先生治学四记	343
汪刘生	先生的教诲与我的成长	350
程 亮	融会古今 兼蓄中外 ——瞿葆奎先生教育思想纪略	356

# 中国教育学科的百年求索

瞿葆奎 郑金洲 程 亮

**【摘要】**在 20 世纪的百年中，中国教育学科在异域理论的“驱动”下，在其他学科的“挤压”下，在意识形态的“控制”中艰难行进，努力挣脱依附的生存处境，谋求自主的发展空间。探寻中国教育学科走过的历史轨迹，有助于洞悉它们的新世纪的发展路向。

**【关键词】**中国教育学科；教育学。

**【作者简介】**瞿葆奎，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教授，现任中国教育学会顾问，教育学分会学术顾问，教育理论刊物专业委员会名誉理事长，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教育基本理论学科规划组顾问；郑金洲，教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浦东干部学院科研部主任；程亮，教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讲师。

20 世纪是中国教育学科艰难创生、曲折发展的世纪。伴随着中与西的文化激荡，传统与现代的思想交融，中国教育学科逐渐地从译介走向编著，从移植走向创生，从草创走向发展。教育学者们百年来以执著的精神、笃实的态度、质朴的思维，成就了中国教育学科发展史的世纪篇章。站在 21 世纪的门槛里，隔着时间的距离，回眸这段历程，不仅能窥视中国教育学科所沐浴的阳光，更能体味到她所历经的风雨。

教育思想史与教育学科史，不是两个“等价”的概念。在中国，教育思想史可以上溯到两千多年以前，但是教育学科史迄今却不过短短百余年的历程，而启动这一历程的是以日本为媒介的“西学”引介。促动这些引介的直接动因，还是新办师范学堂的课程“急需”。当年，所谓“办理学堂，首重师范”，而“教育为师范学堂之主要学科”。中国教育学科的历史和师范院校的发展乃唇齿相依。之所以借道日本取法“西洋”，主要是因为中日地理毗邻、文化同源。清末张之洞就说：“致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费省，

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sup>①</sup>一时间，清廷公派、民间私往日本的学生甚众，多攻读师范速成科。这些学生归国后，又有不少成为师范学堂的译员或教习，成为引介教育学科的主要先驱。他们以译书立说为要务，广揽教育学说，拓展国人视界，推进了教育学人的思想“启蒙”，以及教育学科的学术“建制”。

在中国教育学科史上，1901年是个值得珍视的时段。就在这年，罗振玉创办了中国最早的教育专业杂志——《教育世界》；王国维译介了第一本完整的教育学著作——立花铳三郎讲述的《教育学》。这本著作连载于《教育世界》第9—11号，被视为“教育学”在中国的始点。但在此前，还有两门教育学科分支的著作先行引入中国，即是：田中敬一编、周家树译的《学校管理法》（载《教育世界》第1—7号）；三岛通良著、汪有龄译的《学校卫生学》（载《教育世界》第1—8号）。其后，《教育世界》又先后刊载了汤本武比古著、王国维译的《教授学》；原亮三郎编、沈纮译的《内外教育小史》。1902年，木场贞长著、陈毅译的《教育行政》付梓。中国教育学科的园地又添了“新蕊”。

上述著作都是所谓“进口货”，说的是他域的教育，解的是他国的问题，终究不能替代国人自己的“言说”。在引进、积累之后，国人就尝试立足中国实际，兼蓄西方理论，自编相关教育学科的著作，从而迈出了国人自主“治理”教育学科的最初步伐。朱孔文编的《教授法通论》（时中学社，1903），王国维编的《教育学》（教育世界社，1905），蒋维乔著的《学校管理法》（1909），黄绍箕和柳诒徵著的《中国教育史》（1910）<sup>②</sup>，袁希洛编的《教育行政数日谈》（1912），俞庆恩著的《学校卫生讲义》（上海江苏教育会，1915）等等，都称得上是各自领域的“先行者”。与同期的译作相比，这些著作在“量”上相当有限，在“质”上尚显稚嫩，但也不乏融合本土经验的作品。这是一个“方长、方成”的时期。总体来说，清末民初的教育学科体系，无论是内容还是结构，都深受赫尔巴特及其学派（Herbart and Herbartians）的影响，同时也符合当时师范课程设置的要求。这意味着，“理论”的驱动和“实践”的需要，构成了中国教育学科发展的原初动力。

随着社会政制的更替、教育情势的发展，尤其是在西方的留学生归国和

① 张之洞：《劝学篇·外篇·游学第二》。

② 一说为1902年。见孟宪承、陈学恂、张瑞璠、周子美编：《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第14页。

杜威 (J. Dewey) 以及孟禄 (P. Monroe)、麦考尔 (W. A. McCall) 等访华的直接推动下, 中国教育学科发展的“风向标”由“中道”日本转向“直捷”西方。19世纪末20世纪初, 西方的“教育科学化”运动, 冲击了以赫尔巴特为代表的思辨教育学, 初步建立了经验科学的教育学, 即所谓单数“教育科学” (educational science)<sup>①</sup>。与此同时, 教育学在与心理学、伦理学、生理学、社会学、统计学等学科 (认真说来, 这里的“学科”是“科学”。下同) 的双向渗透中, 又衍生出一批交叉性或边缘性的教育学科分支, 形成了所谓复数“教育科学” (educational sciences) 概念<sup>②</sup>。这一概念意味着大量社会学科, 还包括某些自然学科, 应用于教育领域所形成的分支学科群。大抵在20世纪20年代及稍后, 这些分支先后在中国“登陆”, 于是建立了现代教育学科的一定体系。与清末民初相比, 这一时期译介尚盛, 但已不及国人著述的规模, 而且“登陆”的方式也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 有些仍然走的是先译介后编著的路线, 如教育社会学、比较教育学等; 有些是先有国人编著, 而后又引介西方的相关著述, 如教育哲学、教育统计学等; 还有些仅有国人的编著, 似未见引进相关的学科性著作, 如教育伦理学、教育生物学等。可略列表举例如下:

1919—1949年国人早期译介和编著的部分教育学科著作<sup>③</sup>

教育学科	早期的学科著作	国人早期译介的学科著作	国人早期编著的学科著作
教育哲学	1904年, 霍恩 (H. H. Horne) 著《教育哲学》 ( <i>Philosophy of Education</i> )	1924年, 豪恩 (霍恩) 著、周从政译述《教育哲学》 (中华)	1923年, 范寿康著《教育哲学大纲》 (中华学艺社)

<sup>①</sup> 1798年, 德国教育家里特 (K. Ritter) 在《由教育学批判以证明普遍教育科学之必要性》 (*Kritik der Pädagogik zum Beweis der Notwendigkeit einer allgemeinen Erziehungswissenschaft*) 中, 明确提出了“教育科学” (Erziehungswissenschaft) 概念。见黄向阳:《教育知识学科称谓的演变: 从“教学论”到“教理论”》, 载瞿葆奎主编:《元教育学研究》, 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第299页。

<sup>②</sup> 1912年, 瑞士心理学家克拉帕雷德 (É. Claparède) 在日内瓦指导一个教育心理学研讨班时, 明确提出了复数“教育科学” (*la sciences de l'éducation*) 概念。

<sup>③</sup> 侯怀银:《20世纪上半叶中国教育学发展问题的反思》(华东师范大学2001年博士学位论文); 瞿葆奎主编, 瞿葆奎、沈剑平选编:《教育学文集·教育与教育学》, 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黄向阳:《教育伦理学辨——兼析教育问题的哲学反思》(华东师范大学1994年硕士学位论文); 王承绪主编:《比较教育学史》, 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等等。

教育伦理学	1897 年, 杜威著《教育伦理学》( <i>Educational Ethics: Syllabus of a Course of Six Lecture-Studies</i> )、《构成教育基础的伦理原则》( <i>Ethical Principles Underlying Education</i> )		1932 年, 丘景尼编《教育伦理学》(世界)
教育社会学	1917 年, 史密斯(W. R. Smith)著《教育社会学导论》( <i>An Introduction to Educational Sociology</i> )	1918—1919 年, 史密斯著、刘著良译《教育社会学导言》(载《安徽教育月刊》)	1922 年, 陶孟和编《社会与教育》(商务)
教育生物学			1947 年, 张栗原编《教育生物学》(文化供应社)
教育心理学	1903 年, 桑代克(E. L. Thorndike)著《教育心理学》( <i>Educational Psychology</i> )	1921 年, 哥尔文、沛葛兰著, 廖世承译《教育心理学大意》(中华)	1922 年, 舒新城编《教育心理学纲要》(商务)
教育统计学	1904 年, 桑代克著《心理与社会测量》( <i>Mental and Social Measurements</i> )	1928 年, 塞斯顿著、朱君毅译《教育统计学纲要》(商务)	1922 年, 薛鸿志著《教育统计学大纲》(北高师编译部)
教育测量学		1927 年, 杜佐周编译《麦柯教育测量法撮要》(民智书局)	1922 年, 张秉波、胡国钰编《教育测量》(北高师编译部)
比较教育学	1817 年, 朱利安(M. —A. Jullien De Paris)著《比较教育的研究计划与初步意见》( <i>Esquisses et vues préliminaires d'un ouvrage sur l'éducation comparée</i> )	1917 年, 余寄编译《德英法美国民教育比较论》(中华)	1929 年, 庄泽宣编《各国教育比较论》(商务)

课程论	1918 年, 博比特 (F. Bobbitt) 著《课程》(The Curriculum)	1928 年, 波比忒 (博比特) 著、张师竹译《课程》(商务)	1925 年, 余家菊著《课程论》(《中华教育界》第 19 卷第 9 期)
.....	.....	.....	.....

其实,这种学科分化的景象,从《中国教育辞典》(中华,1928)和《教育大辞书》(商务,1930)这两本有影响的教育专业辞书中就可窥见一斑。除了学校管理学、学校卫生学以外,它们还收录了教育哲学、教育理论学、教育伦理学、教育美学、教育社会学、教育病理学、教育心理学、教育统计学等辞目。从形成机制来看,这些学科主要集中在两类:一类是以“他学科”为理论框架,分析教育活动中形而上的、社会的或个人的问题;另一类是研究如何运用科学的方法来分析教育活动的学科。它们的涌现,既反映了 20 世纪初叶西方教育学科“科学化”的基本成果,同时顺应了国际教育学科分化的总体趋势。有些学科诞生不久,便在中国教育学科的殿堂里占得了席位。

新中国成立后的 50 年代,这些初具形态的教育学科接受了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改造。在“以俄为师”、“全面学习苏联经验”的号召下,这种改造逐渐演变成按照苏联教育学科体系加以规划。中国的教育学科只开一扇“北门”,在数量上大为收缩,仅留下了教育学、心理学、各科教学法、教育史等学科;在内容上倒向了苏联教育学者的研究成果,禁闭或批判了西方学者的教育理论。中国教育学科经历了一次“血透”。“引进”又一次成了教育学科建设的主题,而重点在译介苏联的“教育学”教材,如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奥哥洛德尼柯夫和申比廖夫著的《教育学》、叶希波夫和冈察洛夫著的《教育学》等等;虽逐渐有些结合中国实际的自编教育学科教材,但框架上,甚至内容上基本是苏联教育学科的“复制”。这是一种“大教育学”的体系,它不仅使自身背负上“沉重的翅膀”<sup>①</sup>,而且砍宰了教育哲学、教育社会学、比较教育学、教育统计学等分支学科。与这种“论”的“教育学”相映衬的,主要是教育史学科的建设。在外国教育史方面,先是翻译了麦丁斯基的《世界教育史》,康斯坦丁诺夫、麦丁斯基、沙巴也娃的《教育史》等等;而后又改编和自编了一些外国教育史的教材;在中国教育史方面,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挖掘和整理一些资料,编写了一些教材和讲义,并在学科体系方面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探索。这些学科探索,试图以马

<sup>①</sup> 陈桂生:《教育学的迷惘与迷惘的教育学——建国以后教育学发展道路侧面剪影》,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89 年第 3 期。

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确立适合新中国教育需要的学科体系。但是，在1949—1966年间形成的这些断续的、局部的、零星的、有限的学科建设成果，随着“文革”的到来，迅速淹没在一统的“语录化”教育表述之中。这是不堪回首的当年，又是必须回首的当年。它给中国教育学科史添加了一些史无前例的、苦难的、独特的国际笑料。这建国后17年的教育学科建设，也全部被批斗并付之东流！

历经了三十年的曲折或中断，中国教育学科的“家园”百废待兴。恰恰在这段岁月里，随着跨学科或多学科的研究日盛，教育学与经济学、政治学、未来学、技术学等学科的相互沟通渐密，西方教育学界又迎来了教育学科分化和发展的新高潮。在开放的背景下，从苏联因袭而来的“大教育学”体系，不仅与国际教育学科分化的整体趋势相悖，而且难以适应新时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需要。冲破这种“大教育学”体系，建立教育学科分支体系，成为当务之急。首先是恢复和重建一些教育学科，如教育哲学、教育社会学、比较教育学、教育统计学、教育测量学、教育行政学等；其次是新建一些中国教育急需的学科，如教育经济学、教育政治学、教育法学、教育文化学、教育生态学、教育评价学等等。除了重点译介西方的教育学科成果以外，编写相关的学科著作，建立专门的研究学会，开设专业的教育课程，等等，都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教育学科体系的建设。尤其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教育学科“自我意识”的觉醒，两门以教育理论本身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元教育学和教育学史，逐渐进入了中国教育学者的视野。其中，差不多每门教育学科都拥有若干本国自主撰述的著作，从这百花丛中，似乎可以窥见中国教育学科建设的不少新思维、新风貌、新成就<sup>①</sup>。至于它们的贡献厚薄，总得有几十年的时间检验。如果说1919—1949年是中国教育学科的初创期，那

<sup>①</sup> 如黄济编著《教育哲学初稿》（北京师大出版社，1982；《教育哲学》，1985），陆有铨著《现代西方教育哲学》（河南教育出版社，1993）；鲁洁主编、吴康宁副主编《教育社会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潘菽主编《教育心理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邵瑞珍、皮连生、吴庆麟编《教育心理学》（上海教育出版社，1983），张大均主编《教育心理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厉以宁著《教育经济学》（北京出版社，1984），邱渊著《教育经济学导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王善迈主编《教育经济学概论》（北京师大出版社，1989）；王承绪、朱勃、顾明远主编《比较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吴文侃、杨汉清主编《比较教育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陈玉琨著《教育评价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陈孝彬主编《教育管理学》（北京师大出版社，1990），孙绵涛著《教育行政学》（华中师大出版社，1998）；万嘉若、曹揆申主编《现代教育技术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1991），尹俊华主编、戴正南副主编《教育技术学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陈桂生著《“教育学”辨——元教育学的探索》（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叶澜著《教育研究方法论初探》（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王坤庆著《教育学史论纲》（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唐莹著《元教育学》（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等等。

么这一时期则是中国教育学科的发展期。与初创期相比，处在发展期的中国教育学科不仅在分支数量上有大幅增加，而且呈现出一些“辩证”的特点：在领域上呈现出分化与整合的统一，在内容上呈现出“西学”与“中学”的会通，在方法上呈现出定量与定性的互补。

几度兴废，几番沉浮。世纪百年，见证了中国教育学科从牙牙学语、蹒跚学步走向独立言说、自主行进的曲折历程，涌现了不少先声之作，扛鼎之著，综合之论，特色之述。虽然教育学科的“家族”渐趋庞大，但它的发展是没有止境的。可以说，“在从某一角度分析教育的某一方面或某一组成部分的层面上，有多少涉及‘人’的学科；在教育研究的层面上，有多少可用于研究‘人’的问题的方法，便有可能产生多少分支学科；在把教育作为一个整体，从多种角度同时进行综合研究的层面上，教育领域内有多少种具有现实作用和影响的实际问题，就有可能产生多少分支学科”<sup>①</sup>。而且，教育学科的分化层级也在向“纵深”拓展：从一级学科间的交叉逐渐向二级乃至三级学科间的衍生迈进。这些学科有的已较成熟，有的正在发展之中，有的还处在初生之际。

## 二

中国教育学科是“西学东渐”的产物，是在译介西方教育学科的过程中形成的。在这一过程中，源自西方的教育学科必然与中国教育实践之间产生某种摩擦或张力，因此，如何克服它们，使教育学科贴近中国教育实践，并裨益于中国教育实践，自然成为许多中国教育学者百年的学术追求。这是一种特殊的“中国意识”，也是一种普遍的“本土意识”。正是在这种意识下，他们感到，“教育学有共同之原理，亦有本国之国粹”，因而不能简单地移植或照搬外来的教育理论，而必须对这些“舶来品”保持一种“警觉”。

这种“中国意识”，也许是一种“本能”，伴随着各门教育学科在中国的成长。当年，吴俊升曾提出“中国教育需要一种哲学”<sup>②</sup>；雷通群曾倡导“使教育社会学成为中国化”<sup>③</sup>。萧孝嵘也曾说：“我国人的心理背景与他国人的心

理背景自有一些差别，故在有些事件中，不能根据国外之研究结果推知本国

<sup>①</sup> 瞿葆奎、唐莹：《教育科学分类：问题与框架》（教育科学分支学科丛书·代序），载吴康宁：《教育社会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2页。

<sup>②</sup> 吴俊升：《中国教育需要一种哲学》，载《大公报》1934年11月5日。

<sup>③</sup> 雷通群：《教育社会学》，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例言”第1页。

的情形。本书为顾及此种特殊背景起见，尽量采用我国的研究资料。在某些问题上，如无本国的资料，或有之而在某些方面尚有问题，则采用国外的资料。”<sup>①</sup> 罗廷光曾同样认为，“不可把外国教育行政书籍直接拿来应用——况真正精心结撰之作仍不多觏。我们要做开创的工作，要本远到的目光，渊邃的见解，认清本国教育行政的问题，运用科学的方法和专门的智能以为解答；更当就教育行政之‘学’与‘术’本身作进一步的研究，以求树立本门学术之深厚的基础”<sup>②</sup>。……这些学者都注意到，西方的教育理论植根于西方的教育土壤，况且它们也不是不证自明的、完满无缺的，因而不能简单地移诸中土，相反我们必须立足中国教育情势，对它们进行必要的改造。

“改造”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在 20 世纪上半叶，似乎就涌现了诸如下列的方式：

一是“删削”式。例如，1905 年湖北师范生编译波多野贞之助讲义的“例言”中说：“是编是由日本波多野先生折衷中西诸学说，综论教育之原理，以国民教育、道德教育为宗旨，不偏重个人教育，亦不偏重社会教育。兼按中国情势立言，一切奇袤险怪之谈，概从删削。”<sup>③</sup>

二是“添加”式。例如，余家菊等在《中国教育辞典》的“凡例”中就说：“本书力求成一册‘中国的’教育辞典，而不愿成为一纯粹抄译之作，故于本国固有之教育学说、教育史实、教育名家，乃至于教育有密切关系之各项事例，莫不留意搜采。”<sup>④</sup>

三是“参合”式。例如，1914 年张子和在《大教育学》的“自叙”中说：“但其原本，实草创自日本教习松本、松浦二氏之手。余为中国产，思欲讨论修饰，以适合于中国教育界之理想、实际，遂不惮搜集近今东西人之名著，参合而折衷之，思想之崭新，资料之弘富，盖皆馀事也。”<sup>⑤</sup> 这已不是简单地“堆砌”外来教育理论，而是体现中国教育学者本人的理论选择和综合素养。这种选择和综合，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中国教育学者的创新精神。

四是“改易”式。例如，赵演改译查浦曼（J. C. Chapman）和康次（G. S. Counts）的《教育原理》的译者序中就说：“但因鉴于该书例证，全系采自美国，且处处就美国情况立论，姑译者采取改译的办法。一切外国材料

<sup>①</sup> 萧孝嵘：《教育心理学》，正中书局 1944 年版，“编辑大意”第 2 页。

<sup>②</sup> 罗廷光：《教育行政》（上册），商务印书馆 1943 年版，“自序”第 1 页。

<sup>③</sup> 金林祥主编：《20 世纪中国教育学科的发展与反思》，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60—61 页。

<sup>④</sup> 余家菊等编：《中国教育辞典》，中华书局 1928 年版，“凡例”第 1—2 页。

<sup>⑤</sup> 张子和编纂：《大教育学》，商务印书馆 1914 年版，“自叙”第 2 页。

不能适用者，尽行删除，易以中国材料。且设法就中国情况立论，使读者觉得书中所讨论的，即是“中国的教育原理。”<sup>①</sup> 理论是外来的，材料是中国的，这种“大手脚”似易损原著的整体风貌。

五是“融化”式。例如，朱兆萃在《教育学》的“例言”中说：“本书对于国人所创设的教育主张、教学方法，作者加以搜罗，融化在系统中，努力于国化，以期渐成为自己的制造品，而非舶来品。”<sup>②</sup> 这种方法提升了境界，通过融入国人自己的研究，实现对外来教育理论的渐进式改造。

诸如此类，如此等等。这折射出中国教育学人谋求教育学科“中国化”的良苦用心。这种“用心”，最初指向“日本化”，而后指向“美国化”。时至20世纪50年代，它又与“苏化”的现实联系在一起，而“苏化”又意味着切断已往、抵制西方。正当1957年，针对苏联教育学科中存在的僵化、教条化倾向，曹孚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学“一向把历代的教育学方面的文化遗产，作为自己的科学源泉之一”，“可以而且应该从过去的教育学与教育思想中吸取与继承一些东西”。而且，“教育，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在一经形成之后，有它相对的独立性，教育思想与教育学术的发展有它自己独特的资料与规律。”<sup>③</sup> 割断现实与历史的联系，漠视新与旧之间的传承关系，不可能有中国教育学科的发展。但是，在努力探寻“教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一些学人一方面要求以马克思主义教育学说、毛泽东教育思想为指导，以中国教育实践为出发点，建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学、中国的社会主义教育学；另一方面却又把苏联的教育学当作是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社会主义教育学的化身。由此使“教育学中国化”简化为苏联教育学与中国教育实践相结合。当年，瞿葆奎也就犯过这种错误的“代数学”。“中国化”的道路艰辛而又曲折！初步整理的“中国化”思路，在“左”的思潮下“夭折”了——在西方教育学是“资本主义”的、苏联教育学成为“修正主义”的情况下，中国教育学科必然闭关锁国，必然陷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策汇编”和“工作手册”的窘迫之中，从而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阶级性突现、学科性失踪的“异化现象”！

我们认为，1961年周扬在高校文科教材编选会议上提出的这点意见是正确的：“要编出一本好的教材首先要总结自己的经验，整理自己的遗产，同时

① 查浦曼、康次著，赵演改译：《教育原理》，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17页。

② 朱兆萃：《教育学》，世界书局1932年版，“例言”。

③ 曹孚：《教育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载瞿葆奎、马骥雄、雷尧珠编：《曹孚教育论稿》，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13、223页。